

月照波心一顆珠

詩人譯詩選集

鍾毅帆 選編



邹荻帆选编

月照波心一颗珠

——诗人译诗选集



羊城
出版社

月照波心一颗珠

——诗人译诗选集

邹荻帆 选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25印张 1插图 350,000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30册

书号 10261·557 半精装定价 3.15元

序 言

邹荻帆

大约在两年前，花城出版社的罗沙，来北京时，谈起外国叙事诗选《少女的声音》受到读者欢迎，询问我是否还能为他们编选一点外国诗。我迟疑了好一会儿，凭心而论，我既不是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大学时代读过两年外文系，根本没有读好，而且早奉还给老师们了。

思索了好一会儿，我说：倒是有一个选题可以考虑——诗人译诗选集。他当即称好，并且嘱我来选编。而我，大概是听他称好，一时不自量力就答应了下来。此后，花城出版社登了广告，罗沙和杨光治也曾几次催促，终因自己忙于一些其他事务，直至现在才初步编出来。

应该说这还只是一个试编本，一定还有一些诗人译过诗，而这儿遗漏了；有些诗人有比这选本上译得更得意的诗，而这儿并没有列入。有些诗人译了很多得意的诗，但由于是诗人译诗选集，而不能选入更多。又由于是中国诗人译诗选，是以我国诗人所译为主，就无法求外国诗人在历史上、地区上的平衡，也不求题材和流派上的平衡。更多的是着重在我国诗人翻译艺术上的借鉴。

当我决心要编这本选集后，就向译过诗的诗人发出求助信。在信上我提出了一点要求，请他们选自己最喜爱的译诗给我们，不限于只选一家，不限时代，不限国家和地区。只希望大体在 250 行左右，并说了个交稿的时限。这里面的译诗，几乎全是诗人自选的。极个别的是由我先选后征得对方的同意的。还有辛笛、赵瑞蕻的译诗一直未等来，而我实在不能再拖延了。至于已经谢世的诗人，我就只能按我的爱好来选了。

我之所以请诗人们选自己最喜爱的译诗，是有如下想法的：

我这样想，诗人之所以译这些诗，而且是他最喜爱的，总有其道理；而诗人的译作，则会与他的创作有千丝万缕的因缘。不论他已经创作过多久，而后才译诗；甚或他因译诗而引起创作兴趣；或者创、译同期进行。正是基于与诗人创作相联系的这一点上，所以才选出这样一本选集。但我请读者们不要那样太简单地得一个结论：谁译了哪些诗，谁就一定是受了那些诗的影响。不是这样的，诗人的创作是多方面原因而产生的。诗人译诗，也可能是只因为自己对其某一点感到兴趣而译出的，各个诗人所采取的角度不同，程度也不同，但就是这一点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不可能说明这里面的哪一位诗人，对哪一首外国诗具体有过什么兴趣，因而才译了它。这应该是由诗人自己来说明的。而我在发出求助信时，也并未提出考题说：“您为什么要译这首诗？”因而诗人们也未给答卷。我之所以未出“考题”，有着这样的想法：其一，外国作者的诗是客观存在，有其价值，还得尊重历史；其二，诗人们往往会拒绝这种“考试”，何况我更无法让谢世者青春永存，来回答我的请求；其三，留给读者更

多思想驰骋的疆域，更深入欣赏这些原作者的创造，进而思考诗人们为什么要译这首诗。我想，这样比一个简单的答案会更合适一些。

我不惭浅陋，虽也选了自己的几篇译诗，实有南郭先生之嫌。而作为一个编辑，也可说是一个读者，在读前辈和同时代的诗人的译作时，不无一些感受。

记得当我还是中学生时，就读一些诗人的创作，也读了他们的译诗。（请原谅我这儿不提及我曾热爱过的，另一些并未从事译诗的诗人。）譬如说，我读过郭沫若的《太阳礼赞》、《匪徒颂》、《春莺曲》，也读到 he 译的惠特曼的诗和歌德的《迷娘歌》。我读过冰心的《繁星》、《春水》，也读了她译的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我读过艾青的《透明的夜》、《大堰河——我的保姆》，也读了 he 译的凡尔哈仑的《原野》、《城市》等诗。我读过戴望舒的《雨巷》、《我的记忆》等诗，而抗日战争初期，我极为有兴趣地读到 he 译的《西班牙抗战谣曲》……我沉思着，这与他们的创作有什么关系呢？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译的诗作启发了我。我本来是因他们的创作，而崇敬他们的诗艺的，为什么他们又译出这样一些诗呢？

我曾经这么想过，《大堰河——我的保姆》写得多么动情。作者如此充满激情地写下了一个农村妇女的痴情，同时又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景象，以至我读着不禁泪潸潸而下。而《透明的夜》则似乎是银幕上的几幅浓郁的画面，闪闪而过，显出一种粗犷的力，写出一种要惊动这宁静的世界的阔笑。而译诗《原野》则写无望的人们，朝向失去了的太阳，徘徊在恐怖与哀怨之中。这就有了不同的意向。《城市》中，只用一行

诗作为一节，这就是：

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

把一个城市的形象一下就烘染了出来，而且不拘一格地给了一种诗的形式。

当我在抗战中读了《西班牙抗战谣曲》，实在说，它们给正在进行创作练习的我以帮助，看旁人如何表现战争，而且进一步使我不得不思索他们为何而战。

于是我不能不说：诗人们，你们的译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给我推开了窗子啊！

确实的，早期一些诗人的译诗，也是开放思想的前驱。惠特曼的民主思想和他的气势磅礴的自由体诗，泰戈尔的人道主义、批判倾向和他的精炼的小令般短诗，无疑在文学的艺术与思想方面都起过推动作用。

时代前进了，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辩证唯物论正以其排山倒海之势开辟历史新纪元，社会主义思潮葆其美妙之青春。人们对诗歌艺术的兴趣与要求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是批判继承民族传统，一方面是批判吸收国外古典和当代的文化。我们的立足点是创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新诗歌，它的光芒应该超出我们的国境，为举世所瞩目。我们国家的巨大变革，引起全世界的震惊，我引以为骄傲。我们的艺术生根于这样的生活土壤里，它应该可以获得同样的殊荣。但这不可能天然地获得，它要求我们具有敢于攀登高峰来采折悬岩上的花朵的勇气，要刻苦地追求艺术质量的提高，研究多种多样的艺术

表达技巧，了解当代世界的诗歌潮流……世界上诗歌的信息我们不能不收听，我们决不能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实行“门罗主义”。闭关锁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只能使人愚昧无知，夜郎自大，故步自封。

在诗人们所从事的译诗中，我们不必也不可能要求它具备一切优点；只要在某一点上可资我们借鉴，就是贡献。

我丝毫不具备这样的水平，对外国这么多诗人的思想艺术特色如数家珍，进行条分缕述。但当我读着我们诗人的译作时，却不能不首先想到这些译诗的诗人。

我感到骄傲的是，在这些诗人中，除了徐志摩不曾谋面外，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或朋辈。徐志摩虽未相识，但当我还读初中时，就沉醉于他那音节铿锵、辞藻富丽的诗篇，那“苏苏是一个痴心的女孩子”和“沙扬娜拉”的声音，至今似乎还不绝如缕。至于我的老师们和朋辈们的译诗更使我一一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他们的劳绩。

郭沫若这位中国新诗的开路先锋，以他高峰上的《女神》，树立了丰碑。只要想一想他的博学广识，诗人们怎能不看见古今中外的群峰，而自诩为“异峰矗立”！郭老译介了外国很多诗人的诗作。他的诗歌的宏大境界与他的社会活动、社会科学修养都是不可分的。

冰心曾以她的《寄小读者》、《春水》、《繁星》吸引了多少赤子之心和诗心，而这位诗人又一直是第三世界文学的热心介绍者（当然那时还没有“第三世界”这个提法），对弱国、弱小民族的同情，使她在二、三十年代就译了泰戈尔、纪伯伦等人的

诗，一直到八十年代还译了尼泊尔、马耳他等国的诗歌。

何其芳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的最早作品当然是《画梦录》。他在《预言》中企望银铃的歌声，轻唤年轻的神，直到在延河边唱《夜歌》。读着这些诗，就使人想念这样一个“何其芳”的名字。而在“十年灾难”中，他以病老之躯，在稍得喘息的时候，就爱上了海涅的诗。德文并无基础的他，采取了愚公的办法，一个一个生字查出来，而后又对照英译，“意近惨淡经营中”。我想，在那样的年月，他放弃了文艺理论研究，放弃了《红楼梦》研究，当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也决非是想通过翻译一点诗来消磨岁月。翻阅他亲手编纂的一大本原稿，我相信他是由于受到海涅的艺术与思想的魔力的吸引而使他晚年献出最后的努力。至于冯至，对中外古今文学都有很高的造诣。他早年就写出了《昨日之歌》，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序言中誉之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又是专门研究德国文学的，译了大量海涅与歌德的诗，必然更有其因缘。这也值得我们认真读读这些译诗。

一想到卞之琳，我就记起三十年代自己曾读过他的《断章》，对诗中的风景、桥上、窗子和梦，印象很深，认为是新的“绝句”佳作；同时还想起《圆宝盒》。我读着想，得不出一个结论，但跳跃的距离组织，却带给我新奇的感觉，使我的想象力展翅。随后，他译了奥登的诗。怎么来评介奥登呢？我从来不曾研究过这位英国诗人，读得也有限，而有一点直感是，这位诗人常是把广大的时代场景、繁复的社会现象，高度浓缩，集中为他所思考的，所要表达的主旨的。那些诗不象白居易的作品那样明白晓畅，而是让读者用自己的认识与想象在他的“诗

原”上去驰骋。这样的诗风在百花园中独具风姿。卞之琳是一位严谨的诗人，他的创作不是“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作品，而是“一句三年得”的；也不是感情与丽句如“烟花三月下扬州”那样可以触目即得的，而需要读者多读几遍，多想一想，用自己的认识与想象力去解释。而诗人译诗的严谨态度，也是罕见的。他决不“自出心裁”地在译诗中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他甚至很“古板”地忠于原作的“音组”、“诗韵式”，按照原诗的押韵，等等，以至使我读来有时感到不很流畅。但是，有什么比忠实于原著更能较好地让我们认识原诗的风貌呢！这也是卞之琳的译诗“费尽心机”之处。在最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卞之琳的《英国诗选》中，他亲手附了一张“修订表”，对每一有误的标点、个别错字等等，都作了极为严肃地进行订正，一丝不苟。而当我建议选他译的拜伦的《哀希腊》时，他却谦虚地说他译的不如杨德豫的。

对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对这一选集中的某几位译者被称为诗人，可能需要作一些儿注解。譬如胡风、黄药眠、梁宗岱、金克木、王佐良、姚奔。其中胡风、梁宗岱曾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姚奔则是同学。胡风当然不必介绍了，他的《野花与箭》，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所写的热情奔腾的诗篇《为祖国而歌》，曾经那样激动过我们；更不可忘的是，他亲手扶植了不少年轻的诗人走向诗坛。他也是在三十年代就致力于译介被压迫民族的文艺作品的一人。梁宗岱已经与世长辞了，他是新月派诗人，早年有过《晚祷》的诗集，爱情和美是他的主题。在我大学的年代，他讲莎士比亚的十四行，同时他还填写同样以爱情与美为主题的《菊花词》，没有铅印，却是手抄，恕我对老师不恭，那

些诗是献给我们的某位女同学的。他译笔十分注重流畅与音韵，使我在早年读他的《流浪者之夜歌》（一切的峰顶）时，过目即能背诵。姚奔是大学同窗，近年从事英文工具书的编纂工作，压迫了他的诗情。想起在那黑暗年代的嘉陵江边，我们共编《诗垦地》的时候，他写了一些追求黎明的诗，以致创刊的第一辑就用了他的诗名《黎明的林子》作为丛刊辑名。而青春时期的他，又把爱情与理想捻合在一起，给他理想中的缪斯与年轻的神的象征物——灯，写了多少热情奔流的诗篇！

一些读者只知道黄药眠、金克木和王佐良现在都是学府的教授，黄是文艺理论家，金是印、巴文学研究者，王是英国文学研究者。黄药眠原来是创造社的诗人，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出版过《黄花岗上》，写过关于黑海的诗篇，又留给我们《伊萨柯夫斯基诗选》。金克木是早在《现代》上发表过不少诗篇、与戴望舒有过长期合作关系的诗人，收进这集子里的是诗人自荐的一首译诗。王佐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写过不少优美的诗篇，由于研究工作，使他辍断了诗创作，虽然，我仍希望能够读到他的新作，他把精力继续献在新诗的繁荣上，译了大量英国诗，其中彭斯的诗是他的贡献之一。

诗人徐迟，现在这么称呼他，在读者中似乎会感到有点与“事实不符”，因为他已经把更多的精力献身于现代化的《哥德巴哈猜想》、《雷电颂》去了，而且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诗人”与“报告文学家”两个称呼之间，我仍然宁称前者。徐迟会谦虚地说：“我都不是。”他还得会心地微笑说：“你要硬加在我头上，二者必居其一，我也只好选择前者。”他在青春时就致力于诗的探索，而且尽了大半生的精力，何况他的报告文学

仍然带有诗的气质。这位目前致力于数学、地质、声光化电的现代化歌颂者，却译介了外国最古典的诗作荷马的名著。我不知道从比较文学者的观点该怎样来与中国古典诗歌来相品评，我想，荷马可以和屈原列入同样的星座。诗人徐迟为他的选择写了详尽的注释，可见出他干哪一项就要钻哪一项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们现在不又看到他是那样认真地在钻研数理化吗！

《九叶集》中的诗人有五位列入选集中，从陈敬容、郑敏、袁可嘉、杜运燮的译诗里，可以看到他们是力图将外国现代的新诗介绍给读者的。这一方面是为了扩大我们的眼界，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有分析地汲取艺术营养，为我们所用。这几位诗人仍在继续进行创作，仍在探索前进。可惜穆旦（查良铮）已经逝世二十年了，我们不能再看到他进行创作了，但他留给我们的大量译诗集，是很可宝贵的。

袁水拍逝世已经三年了。这位诗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都写过不少优秀诗篇，《给顿河的向日葵》是那么清新地抒发了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际主义情怀，《马凡陀山歌》又那么在幽默中暴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我还不忘记，在抗日战争时浓雾沉重的山城重庆，他给我们大学生办的诗刊写稿，他译的彭斯的《我的心呀，在高原》是那么朗朗上口，不论那译笔是否很忠实，但我仍然认为是“佳作”。解放后，他又译了聂鲁达的《让伐木者醒来》。这里是我从诗人杂译的诗选集《五十朵番红花》中选出来的。

.....

我想，如果我继续这样一一排名单介绍下去，读者会感到厌烦，可能已经感到厌烦了。我应该在这里说明一下，对于一

些身体仍然如恒星般存在，而且创作热情还正喷薄而出的诗人，都为读者所熟知，似乎没有必要多加说明，其中如方敬、朱子奇、邹绛、林林、荒芜、屠岸、蓝曼、楼适夷、蔡其矫等。乌兰汗是著名的苏联文学研究家，他大量译介了苏联当代诗歌，对我们借鉴苏联诗歌，做出了贡献；他也是画家，以高莽的名字作画；他不断写诗，愿他写出更多诗篇。

对于诗人们所译的诗篇本身，我说过没有什么要说的，请读者去欣赏。但对绿原译的茨威格的写罗丹的诗，却有一点感想。茨威格以小说名于一世，情节结构的巧妙、主题的独创，每每出人意外。高尔基曾评价说：“艺术家（从事虚构的人）所创造的人们，比上帝（或自然）、历史和人们自身所创造的要优秀得多，而且更有趣不知多少倍。”在这篇诗里，茨威格也用虚构的情节，写艺术家罗丹于衰老之际走进他自己一生所雕塑的群像石林中，他猜想这些石块的深处，“一定有/他自己衰枯的血管里的血/迸涌如火焰，/激溅如火星。”我想，诗人们毕生的诗创作也是如此。茨威格写了罗丹愕然站立在石林之中的感觉：

他又一次感到原始的力量
象伟大的音乐从石头中流淌；
他被赋予了
使命，
要用最后一凿
创造生命于自己的生命之上，
被造型的石头竟比时间还强！

他在自己的艺术形象身上
认识到伟大的不朽之光。

茨威格用独创的构思来塑造这位大艺术家，值得我们借鉴，而他对艺术的评价，促使诗人们珍重自己的创造，呕心沥血以赴；待到日后回顾自己创作历程，也应该以罗丹步入自己雕塑的石林的情景来相勉。我想绿原在他不少译诗中只选出这一篇，是有他的旨趣的。

罗洛选择了象征派诗人——给读者的想象力留下充分余地的维尔哈伦和弗罗斯特的诗，也选择了写实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刘湛秋既选了被屠格涅夫誉为“创立了我们的诗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学语言”的普希金的诗，也选了善于以微微的喟叹抒写农村与大自然的景色的诗，更选了“婉转低徊的抒情”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这些诗使我们看到艺术表现技巧的宽广领域。我们应该介绍它们，欣赏它们，研究它们。我们当然不是摹仿，而是立足于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艺术的浑然一体的晶体雕塑。

至于我自己译的两篇，只能算是鱼目混珠。我并未对这两位美国诗人进行过全面的研究，只是某一点为我所欣赏，于是查字典而译成。如桑德堡的《对，人民》，我一方面欢喜他以浪漫的色彩来赞仰人民的创造力和大自然的力量，同时也对诗人的想象力表示好感。至于巴德逊还是一个年轻诗人，我欣赏他继承了休士、麦凯诗歌的战斗性传统。

这本选集，因基本上是尊重诗人自选，所以有几篇诗不约

而同地入选了。其中如林林、冯至都选了《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王佐良、袁可嘉都选了《致拉布雷克书》。歌德的《迷娘歌》不但郭沫若就有两种译品，而且还选了梁宗岱的译诗。我不是为了让读者去评断高低，而是欣赏这是诗人译诗，看他们怎样在译诗中流露诗人们自己的诗风。

对国外原诗作者，大体上都有我们诗人写的简介；同一个外国诗人，有的简介是不同译诗者写的，我并未删除，译名也未求统一，以尊重诗人们的原译。有的外国诗人简介已见之于另一处，也不再重复。有些众所周知的外国诗人，则不必写得繁复，甚至不加简介。

这样众多外国诗人的诗，要一一说明他们在艺术上的贡献、将给我们在创作上起到什么借鉴作用，进一步分析每一诗人每篇作品的创作背景、艺术价值等，这远非我的能力所能办到。而哪些方面可以借鉴，我想也应该让读者自己去研读。对美的欣赏也各有不同的角度，我们不可能强迫读者只看这一面而不看那一面。我们可能得到同一颗珍珠，也可能各有所得。

从开始想编这一册诗选集起，我就想着书名。“诗人译诗选集”我觉得失之于直露，而且未能表达出诗人译诗的苦心孤诣，也未能表达出编者为何要编选这一诗集。偶于静夜忆及白居易的《春题湖上》，有句云：

湖上春来如画图，
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照波心一颗珠……

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处在春天，秀水平铺，千山叠翠，美景如画。开放与改革将展开更新更美的画卷。开放思想已经并将继续使诗人们引进外国艺术，亦犹之月亮投进波心，而波心将要把它洗练得如珍珠一般。

当病后需要调养，依然奋力创作的冰心老师，支持这一选集而给我译诗时，我曾就教于她，可否以“月照波心一颗珠”为书名，她表示赞同，于是欣然以之为书名。

1984年7月8日

目 录

序 言邹荻帆

卞之琳	译(七首)	1
方 敬	译(六首)	19
王佐良	译(八首)	31
乌兰汗	译(四首)	51
艾 青	译(三首)	61
冯 至	译(十一首)	75
冰 心	译(九首)	95
朱子奇	译(一首)	115
刘湛秋	译(九首)	137
何其芳	译(三首)	159
邹 绛	译(六首)	171
邹荻帆	译(二首)	193
陈敬容	译(六首)	205
杜运燮	译(四首)	221